



当代外国文学

新的任命

〔苏联〕亚·别克著



新的任命

〔苏联〕亚·别克 著

崔永昌 蒋仲鲸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К
НОВ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

根据“ЗНАМЯ” 1986, № № 10, 11译出

新的任命

Xinde Renmi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0,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1}{2}$ 插页 2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350

ISBN 7-5016-0076-7 / I·77 定价 2.85 元

第一章

我在研究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奥尼西莫夫的生平时，与那些多多少少了解他的人谈过话以后断定：第一次关于他调动工作的不太准确的消息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天传开的。

这一传闻一开始未被证实。日月流转，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依然是国家委员会的首脑。但时至九月，奥尼西莫夫的秘书和顾问们已经得知，（我们用当时有代表性的讲法）决议通过了：从现在起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将从事外交活动，不久他将要到北欧的某个国家去任职。从许多人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说法。

从许多人那里，但却不是从奥尼西莫夫本人那里。他象以前一样，早晨九点整走进位于猎人市场的部长会议大楼二层的办公室。在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到来之前，他的办公桌上已一如既往地放好了关于黑色冶金业、有色冶金业各工厂关于石油和煤炭开采情况的每日简报。他坐到人造革包面的坚硬的橡木圈椅上（奥尼西莫夫手下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爱好以及对贵重家具的厌恶），戴上眼镜，——看东西离不开眼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宽镜架和眼镜片遮住了眼睛下面半圆形的黑眼圈——这是多年来睡眠不足的痕迹。他那似乎雕刻出来的面孔——除去上唇有点凹陷之外，他的脸型十分端正——伏在一行行数字上。他那只白中透黄的小手拿着铅笔，不时迅速地在某个数字下划上一道。削瘦的手指

微微颤抖着。不，这不是老年人的颤抖——奥尼西莫夫刚满五十四岁，不多的几根灰发在满头褐发中并不明显，他的褐发从左边分开，一向分得非常直，象是用尺子分得一样。几年来奥尼西莫夫为难以治愈的手颤所困扰。在安静的时刻颤抖不太明显，当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激动时，颤抖就厉害多了。

医学无法治好这种奇怪的疾病。另外，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蔑视医学、蔑视医生的嘱咐。手抖吗——见它的鬼去！不必注意！同时手指颤抖一点儿也没影响他那一手少年时代练就的漂亮的印刷字体，从商业学校五年级起，他就能通过抄写文件挣到一点收入了。现在他的一切批注都很清楚，他用铅笔写出的每一划都很有力。奥尼西莫夫的下属都记得他那支铅笔，铅是最硬的，并且削得象锥子一样尖。

左手不时地伸向总放在桌上的“朋友”牌烟盒，盒盖儿上印有一个狗头。奥尼西莫夫眼睛不离开打印的字句，同时划着火柴，习惯地、贪婪地吸起烟来。他开始吸烟时已不年轻，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决定他命运的那些日子里。吸上烟以后，就戒不掉了。

没有熄灭的烟蒂还在烟灰缸里冒烟，而奥尼西莫夫又去点下一支烟了。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始终保持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的领导作风，不使自己局限在研究文件上。他在看简报时，经常转向放着电话的小桌子，在转盘机上（这是政府特别线路的称呼）打个电话，与部长、局长们联系一下，要求回答：为什么某家工厂的炼钢产量下降了？某个代号的定货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为什么某个型号的新型钢材的化验分析仍然不合格？当他对部机关的回答不满意时，他依照不轻信的原则，就不耐烦地按一下铃，立即命令秘书接通他与工厂的电话，让厂长或车间主任，有时是工段长听电话。奥尼西莫夫

向他们、这些工厂的人核实从政府电话中听到的东西。他了解每件事的详情细节，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既不相信口头的話，也不相信文件——这是他的座右铭。他给自己确定的工作方法是，使机关永远保持紧张状态。

每日简报处理完了。电报也看过了。在打开的大记事簿（其中每页都以黑体铅字印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冶金、燃料委员会主席”^①的字样）里写下点什么——这些问题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在当天还将研究。他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在冶金业中实行自动化的材料档案。他很快就（这已经是多少次了！）集中精力去看提供设备的图表、安装、投产、使用的运行表，他又要打电话，研究每个细节，对国家计委、机械工业部施加压力，召唤他的助理，给他们下达任务。在墙边书柜旁的圆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报纸，书柜里装满了技术百科全书、关于黑色冶金、有色冶金、固体燃料、化学、地质学的厚厚的手册。《真理报》奥尼西莫夫在家里已经仔细地看过了（看的时候吸了第一支烟），《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是上班时坐在汽车里看的。这里，在圆桌上放的是一叠各工业区的日报，如顿巴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乌拉尔、外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大工业中心的报纸。这些地方报纸已由秘书处看过，给奥尼西莫夫准备好了——用彩色铅笔把他可能感兴趣的地方划了出来。旁边放着科学院的文摘和情报所寄来的外国技术杂志中文文章的译文（奥尼西莫夫只通晓英语）。“冶金出版社”和“煤炭出版社”的新书也放在这里。任何一本书、任何一

① 这个国家委员会的名称与其他机关一样是虚构的。除掉几个按其真实姓名称呼的人物之外，多数人物都是概括形象。另外书中提到的疾病的症状也有所变动。

本杂志，在奥尼西莫夫自己没从圆桌上拿走之前，是不准撤走的。

他离开圈椅，走在打过蜡的、一尘不染的地板上（地板上没铺地毯，奥尼西莫夫不喜欢它，认为地毯是奢侈品），走到桌前。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漂亮的头很大，尽管他很魁梧，中等以上的身材，可看上去，头仍显得很大。但是脖子不够长。因此使人感觉到，他似乎由于永远担惊害怕而缩着脖子。在他坐着时，有人可能认为他是驼背。不，他走路时挺胸抬头。他步履坚决果断，虽然有些沉重。奥尼西莫夫还没走到圆桌前，忽然停下脚步。他的大头垂了下来。有时某位秘书无意中一开门，就看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的这个姿势——站在办公室中间，若有所思。奥尼西莫夫按其职务应该考虑工业的明天和发展前景，可是他的思想却飞向往日。互不相联的、不知怎么就浮现在记忆中的过去的景象，越来越经常地困扰他。

他就这样站在那里——穿着从不变换的黑色条纹西装、领子浆得硬硬的白衬衫，戴着普通的黑领带。他的儿子安德留沙饱读了狄更斯的小说，对他说：“爸爸，你的穿着象是英国的僧侣。”

一双碧蓝色眼睛的目光投向圆桌。现在这一切对奥尼西莫夫还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些书：《钻井》、《电磁选矿》、《焊管机》，还有什么用？还有这最新一期的《煤炭》？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将告别煤炭与钢铁，离开这个职务和这间办公室。

奥尼西莫夫以很大的毅力摆脱了这种发愣状态，戴上眼镜，取过报纸，投入工作。

他的工作人员感到奇怪。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象以

前一样坚定、一丝不苟地领导工作，象以前一样主持会议，寻根究底，了解事情的详情细节，象以前一样严格要求，作风泼辣，丝毫没有丧失(让我们再次使用现代语言)工作效率。他阅读专业书籍，准备七年计划的指标，仔细核查每个数字的根据，似乎他还要长期领导燃料、冶金工业。

……日月流转，胡子永远刮得干干净净的、碧眼的、神态端庄的、严厉的人，国家委员会主席继续工作着，表现出意志与力量，使机关处于紧张状态。

只是在深秋时节，在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前几天，奥尼西莫夫才收到早已期待的公函。他用剪刀剪开信封，读了文件。果然不出他的预料，他作为一名轧钢专家、工程师给中央委员会写的信(要求分配他任何一件符合专业的工作)未被考虑。从现在起，他的关系归外交部了。

现在应该检查一下，在这间办公室里留下的一切是否都很妥当，他再不会回来了。要完成最后的公务，尽最后的责任。他又处理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又打电话，了解、盘问、催促、下达命令。

然后他默默地吸了一两分钟烟，又拿起电话。如常言所说，应该逐级报告：他交出管理权。

奥尼西莫夫通过电话与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相联系，后者除其他职务外，还主管几个国家委员会。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决定我收到了。总结也做完了。请允许我离职。”

他们是老同志了，彼此以“你”相称。捷沃相说：“好吧，你想什么时候去见你外交方面的上司？”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今天就去。”

“干吗今天呢？你忙什么？但总的说来，你不拖延，这

做得正确。”

在这些平静说出的话中，奥尼西莫夫捕捉到的不仅是对自己友好相待的一位老同志的忠告，并且还有指示。后来捷沃相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听取了回答。最后说：

“可能在你走之前，我们还能见面。你常打电话啊，别忘了我。”

谈话结束了。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再次打量了一下书桌和办公室。

看来，够了。该结束了。所有将由副手接办的公事——不管是目前的，还是日后的——都已经交待清楚了。的确，还有一件事——不是最重要的，也没有载入政府指示中的，但对奥尼西莫夫却仍是特别的事情。往日的景象又不禁浮现在眼前。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似乎看到了彼得·戈洛夫尼亚（或者象大家叫的那样，即小戈洛夫尼亚）的黝黑的、长着鹰钩鼻子的面孔。嘴唇的皱折是倔犟的，颧骨下有条凸起的肌肉，在那值得记忆的一九五二年的一个夜晚，以库拉科命名的工厂厂长小戈洛夫尼亚的面貌就是这样，当时他在会议上竟敢揭露奥尼西莫夫。而奥尼西莫夫被迫……对，正是被迫。可是回忆这个干吗呢？他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自己有这种情况：面前突然出现（并且都不是时候）彼得·戈洛夫尼亚紧皱的双眉、无所畏惧的、执拗的目光和厚实的下颌。有什么办法呢？对这位高炉工程师、工厂厂长，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有不为他人所知的义务，也可以说是良心上的义务。

可是现在奥尼西莫夫已经无权使用国家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了。他犹豫了几秒钟，然后又拿起电话，打给重型机械工业部部长，询问为库拉科工厂建造的强力鼓风机的进展情况。部长知道这项订货。他也认识小戈洛夫尼亚，后者要求订购这

种非批量的、功率极大、但体积不大的机器，要把它矗立在库拉科工厂拥挤的场地上。国家委员会主席得到了答复：订货正按进度完成，大约一个月以后开始组装，然后试车。

“请你亲自关心一下这件事，”奥尼西莫夫对部长说，“按时制造出来，按时发货。派最好的安装工人去。”

“是！我记下来了。请放心，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

“不要让我难堪。这对我来说是件良心上的事。我可能不久就离开……”

对话者听到这个消息没感到吃惊，他只做了个简单的反应：

“噢……”

可能知道他即将到一个安静、清洁的小国去。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继续说：

“请努力让它在各方面都符合标准。质量、期限等等。把这件事当成我私人的请求对待。”

“是！我划上三个惊叹号，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

如果说没错的话，这是奥尼西莫夫从自己的办公室，更确切地说是原来的办公室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然后他按了一下铃。秘书长谢列布梁尼科夫应召，象往常一样悄悄地走了进来。他削瘦，低矮，歪着早秃的、剃得光亮的头，站在办公桌旁。将近二十年的秘书生涯把他同奥尼西莫夫联在一起，他同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一起调到这里，进入了部长会议大厦。他早就学会了领会意图，猜测他的上司需要什么，善于悄悄地提出某种方法，会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是位得力的助手。

奥尼西莫夫站起来说：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苏联驻季什兰吉亚^①大使。”

这时他还能开玩笑——他把要去的国家称为季什兰吉亚。他立即又说出了准确的名称。我们就利用一下他的机智，就把这个国家姑且称为季什兰吉亚。

奥尼西莫夫按照自己的习惯，立即转向正事。

“你坐下。我希望一开始你能帮助我。你和我一起去吗？”

谢列布梁尼科夫没有坐。他那双碧蓝的、稍稍凸出的眼睛向下看着，身姿仍然是恭敬的。

奥尼西莫夫的洞察力没有丧失，立刻明白了一切。

“你更喜欢及时分手？”

“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我想……”

“留在莫斯科对我更有用？”

是的，谢列布梁尼科夫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准备的正是这个借口。可这是借口吗？秃头的秘书长的确认为……怎么说呢？当然，改革时代来了。这很清楚。可谁知道……形势可能向各方面变化。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被匆忙地撤了职，说不定又会重新回来领导重工业。而暂时……他，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谢列布梁尼科夫，暂时作为忠实于奥尼西莫夫的人留在莫斯科。一旦有事，他可以给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往那个他戏称为季什兰吉亚的地方发信，并在这里完成前国家委员会主席的委托与要求。如果形势向另外方向发展，如果奥尼西莫夫不能再到工业部门来工作，那么谢列布梁尼科夫在人们面前，在您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面前也问心无愧。

① 俄文中季什兰吉亚的意思是安静的国家。

奥尼西莫夫从半句话中就猜到了这个没说出口的意思，立刻不再考虑它了。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唇稍稍往上翘起，露出坚硬的白牙。奥尼西莫夫的下属很了解他的这种让人害怕的露齿动作。在这种时刻，奥尼西莫夫能够用最凶狠的字眼骂人。他猛地拿起一支烟，划着了火柴。火柴在他的手里颤抖着，他没点着烟，把未燃尽的火柴扔到一旁。他克制住了自己。

“你去吧！给我送两个通用笔记本来。我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了。”

第二章

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在用午餐。

莫斯科街道上不太明亮的灯光通过大窗户照了进来，窗户上挂着双重窗帘：红色的厚窗帘垂在窗户两侧，白绸窗帘拉到气窗下面。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餐桌四周放着十二把罩着帆布套的椅子。镶木地板擦得锃亮。碗柜的玻璃和抛光面闪闪发光。

在餐厅的陈设中你找不到任何私人标记。奥尼西莫夫对生活是否舒适不太讲究，对他的五居室漠然视之。他的妻子叶莲娜·安东诺夫娜也是同样，她在苏联劳动后备军教育局任要职。

主人们没有在住宅里布置过家具，原因很简单：他们在领到房子时，也领到了不知被什么人安放在各房间里的家具。餐厅隔壁的客厅往往几星期都没有家庭成员进去。罩着帆布套的钢琴以及罩着同样套子的椅子原样不动地放在那里。漂亮的花瓶从未插过鲜花，年复一年地放在那里。有时来找奥尼西莫夫的儿子安德留沙的孩子们在这套住宅里变得安安静静，不敢嬉戏打闹。客人们不来这里。

但是，最近两三年，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的一些老同志来过这儿。过去，他们是被迫害的。现在，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看，墙上还挂着他的镶在金色木框中的油画像，军服上佩戴着大元帅的肩章），他们之中有的离开了被铁丝网圈着的

劳改营，有的从监狱中被释放了，有的从流放地回来了。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本人没受过这些苦，迫害的浪潮在几乎要触及到他时，却擦身而过。

有时一个“复活”了的同志给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打来电话。奥尼西莫夫的经过严格训练的秘书处坚决遵守一条规定：凡是想同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讲话的人，只要自称是他的“老同志”或有“私人问题”，立刻就报告。有一次谢列布梁尼科夫受到了严厉的训斥，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他认为最好不要打扰正在自己办公室内主持会议的奥尼西莫夫，后来才报告说有这么一回事。

当然，这类电话很少。但一有电话，奥尼西莫夫什么工作都可以放下，马上拿起电话，高兴地问好，热情地问这问那；即使被苦难和屈辱磨炼得异常敏锐的耳朵，在他的派头和语气中也找不到丝毫官气。他翻着日历，挤出个晚上，确定在家里见面的时间。他与客人经常谈到半夜，回忆着共同的经历以及牺牲了的和健在的同志。他竭力为回来的人做些事情，安排好生活；也就是弄到象样的住房，找到适合的工作或领到养老金。

后来，这套住房的大房间又日日夜夜地空在那里。桌子周围的十二把椅子从未被用来举行欢乐的聚会。甚至在奥尼西莫夫五十大寿那一天，也没请一位客人；住房中依然保持着寂静。安德烈伊卡又用狄更斯的说法，把这个家称作“荒凉山庄”。他暗中把父亲叫作“伟大的沉默者”。只有星期天，全家聚在餐厅里吃早饭和午饭，可是三个人谈不到一块儿。父亲有时也开个玩笑。他偶尔也坦率地说些肺腑之言，或者自言自语地回忆一些往事。

现在，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与平日一样，独自一人吃

午饭。妻子要晚些回来，而他准时在一点半吃饭。熬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各部委的人们要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因为患失眠症的斯大林在半夜工作，而各政府机关也要适应这种作息制度。那时候，奥尼西莫夫的中饭要到晚上吃，有时又象腓特烈大帝那样，在第二天凌晨吃（家里的人都记得这种事）。现在，报纸上刊登了一项特别命令：禁止在八小时以外加班。奥尼西莫夫一向遵守纪律，但他还是最后一个离开国家委员会。他不习惯晚上无所事事，就把大包文件从机关带走，在家里埋头办公。

今天他没再带这包文件。他在国家委员会度过了最后一个工作日，与同僚们告了别。该委员会的新首脑尚未任命，由一位副主席接替他的工作。这大概也是即将进行改革的一个征兆。有人已经把这期待已久的工业管理的改革称之为“革命的变革”。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正在草拟关于改革的建议。奥尼西莫夫没被吸收参与工作。而现在……现在干脆把他从工业部门赶出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他想起了面前盘中的菜汤已经冷却，由于手指发抖，手中的小勺在往嘴里送汤时跳动了起来。奥尼西莫夫一向不贪吃，没有美食家的福气，他喝汤时，没有尝出它的味道。

家庭女工瓦里娅站在旁边看着主人。她系着一尘不染的围裙，戴着白头巾。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平常吃饭总是急急忙忙，瓦里娅对此早已习惯了。每天早晨总能听到他急不可耐地说：“快，快，我要迟到了。”午饭后，他总要休息十五分钟，瓦里娅必须在一刻钟之后，准时地敲敲他的房门。傍晚，他有时回来，只不过是为了换衣服去参加什么招待会。也是来去匆匆。但在忙碌中不会把脱下的衣服扔下不管，他自己一定要把它挂在衣柜里面。瓦里娅不会说奥尼西莫夫是个

沉默的人。他教会了她熬咖啡，煮浓茶，下班之后总要对她说几句有礼貌的话。

今天，他的饭吃得很慢。喝了几勺汤，就陷入了沉思。他对瓦里娅已经说过了，以后无须注意他午休的时间，也不必敲他的房门了。并且开玩笑地说：

“不久我就要到一个国家去休息了。”

是的，从今天起他已经不搞工业了。不需要他了，重工业不需要他了，什么事也不需要他了。从明天早晨开始，他将改在外交部上班，并准备出国去履行新的使命。而现在闲着，不习惯地闲着。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是的，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在改组工业管理机构时，应该采取慎重和循序渐进的态度，不能使用大拆大卸的方法。是的，在中央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曾为他的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辩护，讲了一系列理由。对他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他按照自己的作风只谈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人们报之以一阵沉默。但会上进行的只是预备性的讨论啊！他作为一名守纪律的、诚实的党员可以接受任何一项决议。对这一点谁能怀疑呢？为什么，为什么把他从工业部门赶出来呢？

瓦里娅端来了第二道菜。她看到亚历山大·列昂季耶维奇面色十分苍白。的确，他的脸色从来没红润过，甚至在严寒中，脸也没冻红过。可是现在，浅褐色中的苍白却变成了土灰色。他怎么了？奥尼西莫夫嘴里感到难以忍受的口干舌燥。漂亮眼眶中的一双大眼（白眼珠上有些发黄）在寻找碗柜上的冷水瓶。奥尼西莫夫讨厌老爷式的作风。在家里他从不说：“把这个给我拿来，”“把那个递给我，”他总是站起来，自己去取。现在，他也是这样站起来，向碗柜走了一两步。

他突然感到眼前发黑，胸中气闷，一只手颤抖着去解开上浆的衣领，他极力想站稳，抓住一把椅子，可是却把椅子碰翻了。他沉重地倒在镶木地板上。